

前 言

4-116/22

经过一年多的征集、整理工作，完县政协编辑的《完县文史资料》第一辑和大家见面了。一年多来，广大文史爱好者和各界人士，积极支持我们的工作，特别是一些年逾花甲的老人，不顾年老体弱，亲自走访调查，积极撰写稿件，在此，我们向这些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周恩来总理一九五九年亲自倡导开创的，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惠及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通过组织各界人士撰写亲闻、亲见、亲历的史料，不仅对撰写者可以温故知新，同时也可以为群众，特别是青年后代提供历史知识，使他们从中得到启发教育，培养爱国主义思想。

这一辑编选的共有十五篇，内容相当广泛，也很丰富，但由于年代较远，知情人不多，再加上我们的水平所限，难免会有一些缺点和错误，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另外，也希望各界人士，特别是一些知情的老人和有撰写能力的同志，积极为我们搜集和撰写稿件，无任欢迎！征集的时限，上至戊戌变法，下至“文化革命”以前，重点是近代史部分（戊戌变法以前的重要史料亦可），内容包括军政、工商、教育、文化、农林、科技、社会、历史名人，名胜古迹等等，稿件以亲历、亲见、亲闻为重点，力求真实可靠。今后我们计划陆续出版以后各辑，希望广大读者踊跃投稿！

目 录

完县常庄惨案的经过	周翠楼、周占同、周青山、周国维口述 完县政协办公室整理	(1)	
宁为抗战死，不当亡国奴	——记抗日民族小英雄王璞的生平事迹	丁殿民调查 赵建国及政协办整理	(5)
我的一段悲惨经历	——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	魏永禄	(13)
傅作义将军在北平和解前后		庞墨珍	(16)
刘仙洲传略		清华大学供稿 政协办调查整理	(21)
完县师范教育发展概况		李照临	(26)
老解放区教育工作一瞥	——战争年代从事教学工作的片断回忆	邹琳	(31)
完县地平陇发展简介		王树弟、赵学华、张志忠	(41)
完县苹果种植业发展的历史		邹琳、政协办联合调查整理	(47)
完县城关商业解放前的概况	——访原“信义号”经理臧秋元	邹琳	(50)
完县常庄的制香业		周占同、周青山、周国维口述 完县政协办公室整理	(55)
完县亭西庄的织毛巾业		刘增福口述 政协办整理	(59)
“孙氏太极拳”的创立与发展	——访完县北关任兰芬先生	完县政协办整理	(63)
完县八景		冀致禄	(75)
绝旗租的经过		邹琳	(79)

完县常庄惨案的经过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寇侵占了大片国土，保定、望都等铁路沿线的城市相继沦陷。这年的秋后，我八路军挺进敌后，建立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十月间，八路军的骑兵营来到了完县常庄一带，成立了完县临时政府，组织抗日救国义勇军，号召人民积极参军抗日，保卫家乡，很快就组成了晋察冀军区三分区第十团，在团长王自奉的带领下，积极搜集民间财主家的枪支子弹，筹措粮款，整编队伍，进行训练，准备抗击日寇的侵略。当时二营的第七连，大部分都是常庄村人，连长叫刘兴汉，指导员叫赖庆尧（是长征过来的老红军），他们宣传党的团结抗日的政策，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由于战士们抗日心切，士气很旺，因而样样工作走在前面，声望很大，有模范第七连的称号。

一九三八年农历正月初十日夜晚。乘敌人不备，我义勇军二营全体战士，在营长邓安峰的带领下，前去攻打望都县城，命令五连、六连在火车站附近进行警戒，七连、八连攻打望都的北门。当时抗日义勇军都是当地群众组织起来的。武器装备很差，没有机枪，更没有大炮，只有一些长短不齐的步枪、手枪；子弹也很少，每人只有几粒子弹，不敢轻易放枪。所以攻打北门时，是靠上大梯子摸上城墙去的，上城后首先消灭了敌人的岗哨，然后大开城门，又摸进了伪县政府。当时敌人还正在睡觉，我七连战士当即缴获了敌人的武器，打开了监狱的大门，放出了在押的我方军民二十余人，并消灭了一部分伪军，获得了大批胜利品，于拂晓前胜利完成了任务的。

任务，撤出县城。

日寇对这次失败非常恼火，为了报复，于农历正月十四日，突然奔袭完县城，结果我军未在完县城内，敌人扑了空，便放火焚毁了最繁华的南北大街，许多商店民房，顿时变成了一片瓦砾。敌人还不甘心，又探听到攻打望都的我军七连战士，百分之八十的是常庄村人，便想伺机再次进行报复，并放出风声：“捉住一个黑毛贼（因我军七连都是戴的黑毛皮帽子，所以敌人污蔑为黑毛贼），赏钱一千元”。我军也有所准备，把通往望都的尧城、下叔大桥都已拆毁了，以便阻止日寇的进攻。

一九三八年农历正月二十七日拂晓，敌人从望都出动了三百多人，带着十来辆大汽车和机枪、大炮等轻重武器，直奔常庄而来，中途在尧城搭桥又耽搁了一段时间，约计在早晨八时左右到达常庄村。敌人原计划包剿我抗日义勇军二营，主要目标是七连，但二营已调防到朝阳村去了，在常庄驻守的是我一营部队。由于抗日义勇军刚刚建立，没有作战经验，再加上战士们麻痹大意，认为日寇烧完县城时没有怎么伤人，存在轻敌和侥幸的思想，所以日军到达常庄时，一营还不知道，营长正在集合战士们准备上课，仓促之间和敌人接了火。

老百姓听到枪声，纷纷向村西逃跑躲避，那天正是常庄大集，赶集的人也很多，部队掩护群众边打边撤，但是一营对地形不熟悉，向而撤时进入了鸽子沟和梯子沟，日寇也随之追到山沟里去。这两条沟都是死沟，到了沟的尽头便没了路，是直上直下的峭壁，仅有一条小路，只能爬上一个人去，爬到半山腰上便被敌人打死了，我军的战士和群众许多人都牺牲在那里，而我们打敌人时却打

不着，敌人都藏在两旁的沟岸边上，所以一营的战士在那里伤亡很大，一营的营长负了伤，有几个连长也牺牲了。日寇凭借着有利的地形和优良的武器，猖狂地进行屠杀，枪声、炮声、呼喊声响成一片。

这时，日寇的兽性大发，边走边捉人，共捉住老百姓三十六人，用绳子拴成一串，押赴村西龙潭洞的龙王庙前，不问青红皂白，便架起机枪对准胸膛进行扫射，三十太名无辜的老百姓便含恨倒在血泊里。万恶的日本鬼子看到死尸里面还有动弹的人，便又跑上去用刺刀连戳几刀，然后又在尸体上浇上汽油，放火把尸体点着，全都烧焦了。其中的刘七一，身中枪弹和被刺刀刺伤七处，但因为倒在其他尸体的下面，没有浇上汽油，所以没有烧死，日寇走后又苏醒过来；还有一个周旦子也没有死，其余三十四人都被打死烧焦，辨不出面孔来了，连龙潭洞庙里看庙的霍老婆儿和霍臭儿哥俩也被烧死。真是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另外，在村西土场子里还躺着二十四具尸体，这里的都是被日寇用刺刀挑死的，挑死以后，又用火烧。八十多岁的刘名功老人，因跑不动，被日寇捉住，砍死在大树底下，才连保被捆在树上活活的烧死；还有许多妇女被强奸或轮奸；刘继连、刘川子、刘东哥父子三人都被打死，还有全家人都死绝了的，许多无辜的群众都惨遭毒手。

到了晚上，我二营的两个连埋伏在村口，准备伏击敌人。但是敌人惧怕我军夜袭，没有敢动，龟缩在村东南角上，不敢出来，我军摸到村里，打了一阵，投了一些手榴弹，给了敌人以应有的回击，但终因武器不佳，未能把敌人消灭掉。第二天早晨，敌人又来了二百多人，才把常庄的敌人接应回去，临撤退时，敌人把牲畜财物枪劫一

空，又放火把村里的民房都烧着了。霎时间，整个村庄变成了一片火的海洋，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大火整整烧了一天，弄得常庄村的百姓家破人亡，无家可归，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大惨案。

这次惨案共杀害我抗日军民约计二百多人，现在根据老人们的回忆，仅常庄村被杀害的老百姓能够说上姓名来的就有七十八人，其中妇女四人，儿童一人，另外还有被打伤致残的九人，被奸污的妇女七人，被烧毁的房屋四百九十六间，其它财物损失不计其数，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一次滔天罪行，我们决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决不容许历史的悲剧重演，我们要和日本人民世代友好下去，永远过和平幸福的生活。

（周翠楼、周占同、周青山、周国维等口述
完县政协办公室整理）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宁为抗战死，不当亡国奴

——记抗日民族小英雄王璞的生平事迹

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王璞出生在河北省完县野场村的一个贫农家庭。父亲王三群，母亲张竹子，都是祖祖辈辈受苦的人。王璞自幼就帮助父母种地、垫圈、打水、做饭，养成了勤劳朴实的生活习惯。有一年，野场一带遭受了一场严重雹灾，庄稼颗粒未收。王璞就光着脚丫，拎着小篮，每天在山坡上挖野菜，捋树叶。有一次，他爬上一棵榆树去捋树尖上的树叶时，一不小心摔了下来，屁股被划破了，腿也摔伤了，躺在地上不能动弹。幸亏他姑姑看见了，才把他背回家去。可是第二天，他又一瘸一拐地挖野菜去了。人们都说他从小就有一股倔强劲头，任何困难都不在话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罪恶的侵华战争，沿着平汉铁路向南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被日寇侵占，消息传到野场村，村里人都紧张起来，脸上增添了愁容。连日来，灌进王璞耳朵的就是“鬼子”这个可怕的新词。晚上，王璞躺在炕上缝补衣裳，王璞便在被窝里问道：“娘，鬼子是什么样子的？你见过吗？”娘笑笑说：“鬼子还没来到咱这里，我哪儿见鬼子去，不过你姥姥可见过。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听你姥姥说有八国的洋鬼子结帮窜到中国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杀了不少中国人。你姥姥的腿上还挨了他们一枪。后来临死的时候还摸着腿上的伤疤说：‘记住，这是叫洋鬼子打的’。”从此，王璞的心里便埋下了对鬼子仇恨的火种。

不久，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来到了大悲、野场一带，建立了区公所、农会、青救会、妇救会、自卫会等组织，点燃起抗日的熊熊烈火。王璞的父亲王三群，是野场村第一批秘密发展的共产党员，担任村农会主任。在党的领导下，青年们积极报名参军，妇女们做军鞋，男子送公粮，练武艺。从此，野场村人民便积极开展各项抗日活动，支援八路军的抗日斗争。

一九三八年，八路军住在野场一带整训，子弟兵拥政爱民，经常访贫问苦，军民关系搞得很好，并经常给老百姓讲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做抗日宣传工作。王璞他们经常和叔叔们在一起，帮助叔叔们喂马嚼马，让叔叔们教唱抗日歌曲，他最爱唱的是“风在吼，马在叫……”歌声经常响彻大街小巷，激起人们强烈要求抗日的心情。他们看到叔叔们搞军训，练刺杀，便也学着八路军战士的样子，每人拿一根木棍作枪，并用硬纸片剪成日本鬼子的样子，树起来学练刺杀动作。

一九三九年，王璞入本村初小读书。当时学校没有课本，他就用麻纸抄写，没有桌凳，就坐在石头上学习，鬼子来扫荡，就转移到野外的树丛、山洞，坚持学习。由于他刻苦读书，学习成绩在班级总是名列前茅，曾几次被学校评为“学习模范”。他不仅自己学习好，还带领同学们学习，学校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把同学们分成几个小组，晚上每个小组在一起学习，王璞经常深入到各组去检查学习，帮助同学解决问题，同学们天天坚持上早操，王璞是带队喊操的。为了使同学们提前到校，保证学习时间，他开动脑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向母亲要了块做鞋用的夹纸，表面贴上麻纸，剪成三十多块长方形的小牌，小牌上写上“1、2、3……”等号

码，挂在教室门口墙上，让同学们按到校的迟早，依次拿号牌，每天放学时对到校早的同学进行表扬。这样一来，同学们都争先到校，消灭了迟到现象，加强了纪律性，保证了学习时间。

在共产党、八路军的教导影响下，在学校老师的培育下，王璞的思想进步很快，一九四〇年当选为本村儿童团团长，王伟任副团长。从此，他工作更加积极，带领儿童团员站岗放哨，除奸防特，拥军优属，文艺宣传，送信带路，坚壁清野，各项工作搞得非常活跃。

一天上午，王璞和王伟去放哨，看到远处有个人影朝这边走来，他俩便拿着红缨枪站在大路两旁等候，可是左等右等不见那个人过来，心想：莫非绕后面山沟走了？王璞跑上坡去一望，那人果然正顺着沟里的小路往上爬呢。王璞急忙追过去大喊一声：“站住！”经过盘查，他没有路条，而且说话吞吞吐吐。便提高了警惕，向王伟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快去叫人，王璞继续盘问，拖住他不放，后来王璞便让那人跟着到村公所去，那人走了几步，便回过身来，猛地向王璞一推，撒腿就跑，王璞一边追，一边喊：“抓坏蛋呀！抓坏蛋呀！”只见村游击小队已绕到他的前方，终于把他抓获，后来经过审问，原来是个探听我军情报的特务。

一九四一年秋，日寇调集了大批兵力向太行山扑来，妄图把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口吞掉。我八路军主力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分散成许多小部队，到敌人背后去打击敌人。野场正处在鬼子的包围圈里，东北不远贾各庄一带，就是包围圈的边缘，那儿有个莲花洞，八路军某部就隐蔽在洞里，准备夜间掩护一些小部队冲出敌人包围圈。这天晚饭以后，八路军张班长来找王三群，说是让他带路到贾各庄那边的莲花洞去，可巧三群到区上开会还没回来，王璞便枪上

去说：“叔叔，我知道路，我带你们去吧！”张班长知道王璞是儿童团长，精明能干，便答应了。王璞带领着几十名八路军，克服种种困难，机智勇敢地穿过敌人的重重岗哨，终于胜利地到达莲花洞。

一九四二年春，郝振凯老师在野场小学任教，根据抗日形势的需要，增加了军事课。郝老师对同学们讲：“抗日小学就是培养学生为抗日工作服务，光学文化还不够，还要学军事课；不学军事就不是抗日学校。”老师的话同学们牢记在心里，为了早日打败日本鬼子苦练杀敌本领。他们从实战出发，每天早操练军棍，练爬山，还经常搞夜间袭击。

一天晚上，王璞约儿童团付团长王伟，召集儿童团员们在他家开会，总结了前天夜间北大悲儿童团搞袭击，他们被包围的教训。他向大家检查说：“都怪我思想麻痹轻敌，警惕性不高，如果真是敌人来了，我们可就要吃大亏啦！”付团长王伟也做了检查，儿童团员们也纷纷发了言。王璞见大家讨论得很认真，便乘机鼓励大家，要吸取教训，加强纪律性，树立敌情观念，做好战斗准备。

同学们做后，王璞把王伟留下，商量夜袭北大悲的行动计划，当夜天很黑，伸手不见五指，全村一片寂静。当时间过半夜后，他俩便动身去北大悲侦察情况。出村后，故意不走大道，抄小路向北大悲前进，到村边时停下脚步，听了听，没有动静，便转身跑回村，进行紧急集合。同学们很快便到齐了，王璞告诉大家：今夜集体决定袭击北大悲。这次去只能胜，不能败，路上尤要不能掉队。说完，他便带着队伍，沿着预先侦察好的路线向北大悲进发了。

王璞悄悄地把队伍带到大悲小学门口，让同学们停下，选时从

学校教室里传出讲话的声音：“安定点儿，别乱吵啦！野场的同学今夜可能要袭击我们，我们的人还没到齐，再等一会儿。”就出发迎击。……”听到这里，王璞小声命令王伟，带领十几名少先队员，把守学校门口，并把学校包围起来；自己带领其余的同学往学校院里冲。霎时，喊杀声、鞭炮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好象真打仗似的，北大悲同学见势不妙，从教室里拼命向外突围，但已经晚了，门口窗口都被堵住了，外边不断喊“缴枪不杀！”北大悲的同学无奈，只好举起手来，表示战败投降，王璞他们取得了胜利。

有一次，同学们在山沟里上课，老师把小黑板挂在树杈上，上面写着十个大字：“宁为抗战死，不当亡国奴！”讲课之前，先给同学们讲了一个放命娃王二小，不给敌人带路，却把鬼子引进我军伏击圈内，被我军全部消灭，而他自己却英勇牺牲的生动的故事，然后对同学们说：“象王二小这样英勇的抗日儿童，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到处都有，你们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勇敢？我们应该怎么办？”王璞第一个站起来说：“因为他们是我们共产党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孩子，决心要打倒日本鬼子，我们一定要向他们学习。”老师说：“对！因为他们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今天小黑板上写的这十个大字：‘宁为抗战死，不当亡国奴！’”接着又结合《抗日公约》领着同学反复诵读。这些钢铁般的誓言，深深印在了王璞的心里。

一九四五年的春天，正当抗日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战，打得日本鬼子走投无路、临近死亡的时候，还要缴最后一枪，日本鬼子又要进山扫荡了。野场村召开了紧急动员大会，号召群众坚壁清野，粉碎敌人的扫荡。王璞带领少先队员也积极行动起来。

来，帮助大人挖地窖，埋藏粮食和东西；并在街上刷标语，搞屋顶广播；还把《抗日公约》：“不向敌人说实话，不给敌人去领路；不暴露八路军，不说出村干部；不要敌人的钱，不上敌人的当；不念敌人的书，不吃敌人的糖。”写在一张大红纸上，贴在学校大门口。王璞整天跑前跑后，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他。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日，日寇纠集重兵，向唐河两岸的唐县、完县、沫源一带，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春季大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当时我晋察冀军区九分区后方供给部住在野场村。对于敌人的扫荡，我军民早有准备，八路军的枪支弹药、军衣、军鞋，老百姓的粮食，都认真地进行了坚壁清野，群众都隐蔽在山沟里，我军的后方机关也已转移。与此同时，我军民密切配合，利用山地复杂的地形同敌人周旋，神出鬼没，伺机打击敌人，搞得敌人惶惶不安，寸步难行。从五月一日至六日内，敌人不但一无所得，而且还经常挨打，非常丧气。在这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便象疯狗一样向我手无寸铁的群众发泄。

五月七日清晨，日寇在汉奸庞珠子（已被我镇压）引导下，突然包围了野场村东的石沟（也叫桃花沟）一带。敌人控制了制高点。每个山头 and 沟道路口都布满了敌人，石沟两面的大肚梁和小肚梁上也布满了敌人。这一带的山洞里、树丛中、岸壁里，躲藏着野场、解放、黄岩、龙旺水等村的老百姓，因为扫荡六天来，敌人一直没有到过这里，今天是由于汉奸告密敌人才扑向这里的。敌人搜山开始后，端着刺刀，驱赶着被搜出来的人们，一串串群聚被集结在石沟的一块半亩多的地坎上，共有一百多人，他们当中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鬼子端着枪站在两边的山梁上，在地坎的南面

半山腰的一块小埝上，架着三挺机关枪，人们毫无惧色，以仇恨的目光怒视着山坡上的敌人。

大约在上午九点钟左右的时候，站在机枪旁边的一个手拿八卦旗的翻译官，向着乱哄哄的群众开口了：“他妈的！别嚷了！”然而人们却不听他的，仍在寻找和呼唤着自己的亲人。这时，从山坡上冲下两个鬼子，用枪把向人群里乱打，吓唬群众不许叫喊。等群众稍微安定一些的时候，那个翻译官又摇着旗杆子说：“叫你们来，没有别的，你们知道，八路军的枪支、子弹、军装和粮食，都藏在哪儿？只要你们说出来，就放你们回去，还重重有赏。”尽管翻译官摇晃着身子问，群众就是一言不发。翻译官生气了，大声吼叫：

“说呀！你们他妈的说呀！”人们仍然默默地屹立着，翻译官用旗杆子戳着地吼道：“说呀！你们都没有嘴吗？”“谁知道谁就领着去，大家好活命。”问了好几次，还是没有人理睬。翻译官急了，说：“不说，我们就开枪啦！”然后用眼看了看架机枪的鬼子兵。鬼子都作好了开枪的准备。人们骚动起来，王璞借机在人群中鼓励大家说：“我们决不能告诉敌人一句实话，不要上敌人的当！”翻译官见没有人答话，就又嚷道：“不说就开枪了！”边时有的群众大声回答道：“不知道！打死也不知道！开枪吧，反正是死！”翻译官流着汗，向身边的鬼子作了一个暗示，鬼子便“嗒嗒嗒”……地开起枪来，人们都乱嚷着爬在地上了。然而枪是向上打的，没有伤着人，敌人想用这种方法来威胁群众。

翻译官又吼叫起来：“怎么样？再不说可真要扫射了！”这时，小玉璞冲出来向群众高声喊道：“宁为抗战死，不当亡国奴！谁也不能说！叫他们开枪吧，打死也不说！”敌人的枪口马上对准了王璞的胸膛。年仅十四岁的小英雄，俨然面不改色，英勇屹立，怒视敌寇，并且大骂道：“狗鬼头！不要耍诡计！老子早就看透了你们的心。死了可以，一句实话也不能对你们说！”站在他身边的母亲

张竹子也鼓动着人们：“咱们妇女们谁也不能说！反正是死，不受敌人的骗！”还有人喊：“谁说谁是汉奸！”龙旺水村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看了老伴一眼，往一起靠了靠，说：“开枪吧！死也死在一起！”敌人见逼问不出一线索，便恼羞成怒，一个鬼子恶狠狠地说：“杀不完老百姓，就杀不完八路军，统统的八路！”在这生死关头，王璞用尽全身力气带领群众高喊：“打倒卖国贼！赶走日本鬼！共产党万岁！”只见那个鬼子用手一挥，三挺机枪一齐发射出罪恶的子弹，王璞等一百一十八名手无寸铁的群众壮烈地牺牲了。他们为了抗战的胜利，英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就是敌人制造的骇人听闻的五月七日完县野场石沟大惨案。但是，敌人并没有征服英勇抗日的人民群众，也没有征服王璞小烈士；相反，英雄的形象却震慑了敌胆，敌人一无所得，只好狼狈地缩回老窝去，边区军民取得了反扫荡的伟大胜利。

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完县人民政府，为了纪念王璞和群众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特地召开了追悼大会，并授予王璞烈士“抗日民族小英雄”的光荣称号，并在石峡岭建造了纪念碑。一九六四年八月，中共完县委员会、完县人民委员会、完县各人民团体，又在完县烈士陵园为他建造了纪念亭和纪念碑。一九八四年三月，共青团河北省委又作出决定，在华北烈士陵园，为小英雄王璞塑像。

王璞烈士的死是光荣的死，是重于泰山的死！他生前可贵的革命精神，崇高的民族气节，宁死不屈的英雄形象，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上！

抗日民族小英雄王璞同志永垂不朽！

（丁殿民调查，赵建国及完县政协办公室整理）

一九八五年六月七日

我的一段悲惨经历

——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期间，除了执行“三光”政策，进行烧杀抢掠以外，还大批地抓走华人，到日本去当劳工，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我就是千千万万受害者中的一个。

那是在一九四四年的六月，日本侵略者被中国人民打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便作临死前的最后挣扎，大批抓人以补充国内劳力的不足。我便以“私通八路军”的罪名被他们抓捕起来，经过望都县、押送到石南（石宋庄）劳训所。这里实际还是千座大监狱，无数的中国人被关在里面，周围是岗楼和电网，戒备森严。为了使人们听从他们的指挥，顺从地给他们当牛作马，便整天将棒操训练。行动慢了便打。并且软硬兼施。向人们讲劳工政策说：“你们都是有罪之人，但是到了这里面就都赦免了，死罪也不追究，只要好好干活就行。”这里的生活是非常痛苦的，每天只让吃肉汤饭，每顿每人只给一碗高粱米饭，吃不饱就饿着。铺的是席，到半夜里，铺的是席，盖的也是席，连条被褥也没有。病了也不医治，只好等死。还经常挨打受骂，过着非人的生活。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这里，被当作死狗一样拉出去。真是目不忍睹。

大约在这里训练了一个多月，便送我们到日本去当劳工。先乘火车把我们送到塘沽，坐的是闷子车，没有窗户，闷也闷着。里面黑咕隆冬，憋闷得很。人们几次想要逃条活命，但是都没有成功，被日本抓回来打个臭死。大家都觉得这一条断没有生还的道理，将

永远不能和家人团聚了。

到了塘沽，便又用轮船把我们押送到日本的大阪市。我们这一批共来了三百人，其中有八路军干部、敌工人员、中央军官兵、还有老百姓，都被关在一个大院里，由日本警察看管，除非是出去干活，否则不准出门，在这里也是一天两顿饭，每顿饭一人一个黑面馒头，一块咸菜，一碗开水，每天都要挨饿。但是干的活却很重，我们的任务是在码头上装卸轮船，装卸的货物多是煤、盐、铁之类，有时也装卸糖、粮食、花生、布匹等等。几个人分成一组，限一定时间装卸完，如果到时间完不成，就要挨打。每天从早晨六、七点钟开始干活，一直干到下午太阳落了才收工，一天干十二、三个钟头的活儿，有时货物多了，还要打夜班，夜班从下午六、七点钟开始，一直干到天明，夜里每人只给一包儿饭，也没有菜。这样黑夜、白天的干，真是又困又累。干活时一不顺日本领工的心意，还要挨打受骂。在当时，日本人看待我们简直不如牛马。

我们到日本大阪一年多，没有发过一件衣服，也没有发过一双鞋。只是出国时发了一条毯子，作为过冬之用，白天被在身上当棉衣，晚上盖在身上当棉被。没有鞋穿，便拾了一块大胶皮，裹在脚上当鞋穿。搬运吃食时，每天回来还要挨个地搜身，如果搜出吃食来，就是一顿真打。由于干活劳累过度，挨打受气，又吃不饱，穿不暖，好多人都得了病，有了病也不给治。尤其是住的条件很差，百分之百的人都长了疥疮，抓得脓血淋漓，难以忍受。就这样，饥饿劳累，病魔缠身，天天在死亡线上挣扎。因此，好多人都死在了日本国，尸体使用劈柴火烧掉。记得我们一块去时是三百人，后来却只剩下了二百零七人。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莫大的

损失，而且给日本人民也带来了严重灾难。我们亲眼看到由于战争的原因，日本国内已经看不到青壮年男子，在大街上走的人都是些妇女和老弱病残的人，而且还把战火引到了日本本土，天天有美国的飞机来轰炸，多的时候达到七、八十架，一批批地轮番轰炸。日本的房屋都是木头搭成的，飞机上投的又是烧夷弹，每次轰炸以后都要引起大火，浓烟滚滚，笼罩了整个天空，使白天变成黑幕，无辜的日本妇女和小孩，死伤极其惨重。日本的风俗是火葬，死了就要烧掉，有时死的人太多，又缺少汽油，就把尸体排成大队，架起篝火来烧。当时的景象十分悲惨。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只觉得对我们管理得松了，干活也少了。后来在大街上过，看到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的有汉字，也有日本字，汉字中有“大东亚战争終了”几个字，我们就猜想一定是战争结束了，我们回国又有了希望。后来，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白袖章，上面写的是“中国俘虏”，日本人见了都很老实，不敢再欺侮我们了。这时我们才知道日本是无条件投降了，我们的生活也便得到了自由。但是我们还不能立刻回国，因为海边有水雷，不能通行，也没有船来接我们。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才把我们送回了中国。

回想这一段悲惨的遭遇，使我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充满了无比的仇恨。广大人民决不容许日本军国主义者复活，历史的悲剧决不容许重演，我们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下去，永远过和平幸福的生活。

（完县政协委员魏永禄写于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日）